

沙元炳之后的 如皋县公立医院院长

□白本



1932年如皋县公立医院护训班毕业生合影

历史人物

沙元炳先生追随张謇,兴办实业,闻名一时。作为他在公立医院的继任者,必须也有实干精神。相关人选,如皋当局非常慎重。1927年2月19日(丁卯年正月十八日)《时报》刊出相关消息《医院主任兼代院长》:“如皋县公立医院院长沙元炳,因病出缺。周知事以一时难觅资望相当之人,昨特函请该院主任黄家政暂行兼代,以维现状。”

这两句话新闻,涉及三位如皋名人。周知事是指民国如皋史中末任知事(后更名县长)——湖南长沙人周焘,还曾任吴江县知事。另两位是公立医院的第一任院长沙元炳和第二任院长黄季平。周焘考虑到公立医院院长的选拔不是小事,决定先由黄季平暂时代理院长职务。

其实在这则消息刊出的前一天,即2月18日《时报》已经刊出另一则重要新闻《沙元炳逝世之追悼》:沙元炳,字健庵,前清翰林,曾任江苏省议会议长,为如皋地方教育、慈善、商会、清丈、水利等机关创办人……忽于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病逝,地方各机关,订期开会追悼。据如皋苇航书屋所存《沙君元炳哀启》(抄本):1926年春末夏初,沙家先后有五六人罹患猩红热,于各处隔离疗养。沙先生为此奔波不堪,又患咳血病、肝郁症,不幸于1927年1月29日离世。再据《医院主任兼代院长》,1927年初,黄季平只是代理院长,因此他接任如皋公立医院院长的时间,应该不是《如皋县卫生志(1384—1990)》所记录的1926年。

黄季平最终顺利接棒,成为如皋公立医院第二位院长,说明他还是很有能力的。从他的履历和相关报道,也可以得到佐证。据《如城志》

等书记载:黄季平(1889—1965),名家政,以字行,如城人,书法家黄七五(黄家瑞)之弟。1911年,留学日本宏文学院,后又考入千叶医药学校。毕业回国后,他任南通医学院和江苏省立医科大学病理教授,1921年协助沙元炳创建如皋公立医院,后任院长。1932年复任南通医学院教授。1938年,他为新亚药厂出品之新消梅毒题词:国产新品,功效宏伟(刊于第71期《新医学刊》)。苏北沦陷后,寓居上海,设诊所行医。抗战胜利后,南通医学院恢复,回院任医科主任及教授,后调任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主任及院长。1946年5月出任南通县公立医院院长。1957年,奉命参加苏州医学院筹建,1965年病逝于苏州。

至此,黄季平于1927年代理如皋公立医院院长,后正式出任院长,但1932年去通任职,是否还兼任如皋公立医院院长,有待考证。因此《如皋市人民医院建成八十周年纪念册》中记述黄

季平任职院长时间为1926年至1938年,值得商榷。

无论在如皋任院长,还是去南通任教授,黄季平一直关爱着公立医院的发展。1929年3月5日《时报》刊出《公立医院新屋落成》:“去年春间,本县公立医院院长黄季平,以原有院屋,不敷应用,乃决定购地建筑。一面从事募捐,就南门城内(应为城外)益人桥南,购地建筑新式病房。历数月之久,现已落成。全院屋宇,四十余间,构造精美,设备完善。统计建筑费及设备费约20000余元。除由地方补助3000元,及省款补助4800余元外,余均由募捐而来。该院于二十七日举行落成典礼。”

这则报道对于如皋市人民医院院史极有意义。由于今天的人民医院的老宿舍就位于“益人桥南”旧址,这是将如皋公立医院确认为如皋市人民医院前身的直接证据。新院舍落成的具体时间是1929年2月27日,并非《如皋县卫生志(1384—1990)》记载的1928年。



史海回眸

40多年前南通的 煤炭购进与销售

□程太和

最近一段时期,由于煤炭供应偏紧,引起电力供应紧张,成为众所周知之事。因为我国70%的电力供应都依赖火力发电,煤炭消耗极大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火力发电所占比重更大,那时的煤炭供应,尤其地方企事业单位、民用煤炭供应更是偏紧。我们不妨对40多年前南通的煤炭购进与销售做一回顾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由于煤炭供应紧张,南通市及部分市、县工业系统供销机构通过物资协调解决部分煤炭,供应本系统生产所需,大部分仍由市煤炭供应机构组织供应。此时,煤炭主要由徐州、陕西铜川、澄合、浦白、韩城、山东枣庄及四川、湖北等煤矿供应。南通还在徐州自行开采王门、阎台和柳新煤矿。三矿并井田面积19.23平方公里。南通的无烟煤主要来自山西阳泉、晋城,河南焦作、新密,北京的京西。1979年由于国家原油出口量增加,南通市实行油改煤,节约用油,并增加了陕西煤的调入。这期间,南通市开始与山西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和农机公司协作,以南通的鼓风机、防爆电动机、拖拉机轮胎、煤矿用卷扬机等名牌产品协作煤炭,以后又向山西省提供木材200立方米、线材250吨、桐油30吨、玻璃1.25万立方米、中长纤维15万米、毛呢1万米、纯涤3万米等物资,串换煤炭5.61万吨。后经山西省经委批准,同意南通市派车到山西拉煤,每年供应南通市2万吨煤炭。从1979年开始,南通在山西霍县柏木沟煤矿搞自拉煤,1979~1982年运回煤炭31.22万吨。至此,南通煤炭已形成了国家计划分配、地方煤矿、协作煤3个渠道,其中国家计划分配占70%以上,市煤炭公司从徐州每年购进煤炭达40万吨。1983年,南通市以提供资金的形式,与太原市签订煤炭集资协议,南通提供资金200万元,还本不计息,太原在3~5年内,提供地方小煤矿生产的12~14万吨煤炭。1983年南通与徐州签订协议,徐州煤矿5年内提供南通市超产煤20万吨。除山西、徐州外,南通还在四川、河南、内蒙古等地发展新的协作关系。进入80年代,国家对南通计划煤炭分配比例不断减少,计划外比重不断增加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国家对市场用煤的供应范围,作了具体规定,对城镇居民生活用煤,实行凭证定量供应。1968~1979年,南通市城镇居民1人户、2人户、3人户、4人户、5人户、6人户每月供应生活用煤定量标准分别为:45公斤、60公斤、75公斤、95公斤、110公斤、125公斤。1980~1987年,南通市城镇居民1人户、2人户、3人户、4人户、5人户、6人户每月供应生活用煤定量标准分别为:50公斤、65公斤、80公斤、95公斤、110公斤、125公斤。南通地区所辖6县城镇居民月供应生活用煤略低于市区。笔者1984年7月参加工作,作为1人户单独户口,月供应生活用煤40公斤。城镇集体炊事单位定量供应标准,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和单位人数的多少,每人每天供应标准160~300克。对工业用煤实行计划供应,六十年代前期,煤炭年平均销售量50.67万吨。1967年对工业生产和饮食服务行业用煤采取核定消耗定额,凭证定量供应的方法,以后数年年平均销售煤62.28万吨。当年,南通市共销售煤炭89.62万吨,计划外煤炭占8%。进入八十年代,国家对煤炭经营逐步放开,南通市煤炭市场调节部分剧增,经营煤炭的单位有20多家,年平均销售量达到103.76万吨。市燃料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从90%降至60%左右。激烈的市场竞争,各经营单位开始由管理经营型向服务经营型转变,实行送货、开票、结算上门服务。1980~1987年核定燃料销售单位为197~237家,核销产品338~408种。八十年代,为节约用煤,全市共改造锅炉220台,计400蒸吨,平均热效率由50%以下提高到60%以上。通过开展先进锅炉房和先进司炉竞赛,各企业内部开展煤炭管理百分竞赛,1982年参加竞赛的月耗煤50吨以上共100家单位,月平均节煤4925.90吨。八十年代,全市共有653家享受特定节约奖,共获奖金654万元。1980年4月,南通市委、经委、建委联合发出《关于加强煤渣(灰)统一管理的通知》,规定煤渣(灰)由市燃料公司统一管理回收,7年中共回收煤渣(灰)871.25吨,节约煤炭148.11吨。为此,1985、1986年市燃料公司被评为燃料管理、节约工作全国先进单位,得到国家计委、经委、物资局的表彰和奖励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也说海安境内的“墩”

□王其银

地名掌故

《南通日报》2021年11月15日“城市记忆”版刊载程太和先生撰写的《海安境内的“墩”》一文,从地名掌故角度介绍了“海安境内以‘墩’命名的地名很多”,并举例“青墩”“界墩”“二十里墩”“二十五里墩”“三十里墩”等。

该文介绍情况属实,披露了海安境内许多重要地名的来历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痕迹,值得肯定。但笔者依据有关史料还可以例举一些新的情况。比如带“墩”字的地名海安境内不仅有“青墩”“界墩”“二十里墩”……还有“吉家墩”“营墩”“墩头”等老地名。

吉家墩位于海安原隆政乡境内(现海安市隆政街道),且也曾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该遗址东距黄海老坝港

45公里,西与青墩遗址相邻,两遗址之间的距离大约15公里。吉家墩遗址是1983年由南通博物院徐治亚先生主导清理发掘的,出土文物有石斧、石铈、石凿、骨簋、陶纺轮以及陶鼎、陶豆、陶壶、陶钵、陶罐、陶盆、陶杯等器皿,更奇特的是发现了树皮葬。经徐治亚先生鉴定,吉家墩遗址的文化遗存分早、中、晚三期,与青墩遗址文化面貌相似,“是青墩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”。

值得指出的是,带“墩”字的地名,大多与古代墓葬或遗址有关。海安境内的“墩”是这样,海安以外的与“墩”字有关的地名也是这样,比如高邮的周邨墩遗址、邳县的大墩子遗址、东海的爪墩遗址、丹徒的磨盘墩遗址,以及武进的圩墩、寺墩遗址,还有涟水的三里墩遗址、冶城的谢公墩墓,乃至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等。

其形成原因大多是古时候那地方在

地埋了人,土堆高了,成为地理标志,于是就被人冠名××墩;而一经考古发现有文化遗存,就以小地名命名为××遗址。

当然,叫××墩的,也不全与墓葬有关。前面说的“营墩”在海安李堡镇,这个地名就与墓葬无关。李堡过去叫“李家堡”,因地处海边,历史上常有倭寇骚扰,当地居民筑堡防御,因李姓居民占多故名李家堡,李家堡东南方向的营墩是因与倭寇作战有驻军筑高地设军营而冠名“营墩”。这个地名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在用,当地叫营墩村。

至于“墩头”,则是海安的一个响当当建制镇的地名。该镇驻地位于海安西北部里下河地区的墩头庄,镇区面积78平方公里,辖4个社区14个行政村,有人口5.4万人。墩头庄的东南方向有长塔头遗址,也是新石器时代的,出土的文物不多,但经专家鉴定是青墩遗址的余脉遗址。墩头镇历史悠久,民国时期隶属东台县,

1943年1月23日经苏中区党委、苏中行署批准建立紫石县时划归紫石县。1948年3月7日,紫石县更名为海安县。墩头之名相传因墩头庄西大河中有一高土墩而得名墩头。

话说回头,程太和先生一文中关于海安青墩遗址的记述,说是“1976—1978年南京博物院、南通博物院三次对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”有误,准确的表述应该为:青墩遗址因1973年8月青墩村开挖青墩新河而发现,1977年南通博物院对青墩遗址进行试掘,1978—1979年,南通博物院、南京博物院、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会同无锡博物馆、连云港博物馆考古人员对青墩遗址进行连续两次正式发掘。因此1976年青墩是没有考古发掘活动的,而1979年则是有的。

这样表述,不仅时间无讹,且让人们了解青墩遗址发现的过程以及参与考古发掘的单位,进而更具有史料性。

会掏鱼的人一个午间下来,掏上五六斤或十来斤鲫鱼是不成问题的。

掏鱼洞虽然有趣,收获也颇丰,但这是一个很辛苦的活计,一般都是身强力壮的中青年男人才能干,而且每次去掏鱼时随身都要带上高度烧酒,抽空喝一口,以此暖身,否则,手臂长时间浸在冰冷的水里是吃不消的。正因为辛苦,后来干这一行当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特别是现在由于精养鱼多了,野河野塘里的水质也差,其中野生鱼大为减少,加上人们捕鱼方法也越来越先进,从鱼洞中或泥坎下掏鱼这个行当也就慢慢趋于绝迹了。因为耳濡目染,那种洞中掏鱼的情景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至今我还常怀念看人掏鱼洞带来的乐趣,当然也十分怀念那冬阳暖和、河净水清、鱼丰虾盛的自然生态环境。

能这些场所比其他地方稍微暖和一些,鲫鱼钻进去为的是取暖,而且据说冬季凡钻进水下洞中或泥坎下的鲫鱼都懒得动,有点像冬眠的样子,所以掏鱼人将手伸进去很容易掏到鱼。

我有一位家住通东三余镇乡下的姑夫,当年就被乡邻们誉为掏鱼洞高手,我在少年时期经常去姑妈家玩耍,所以也多次跟姑夫去河边塘沿,为的是亲眼看他从洞中掏鱼。其实掏鱼洞的人所携工具很简单,只要身背一只鱼篓,手持一根两三丈长的竹篙就行。此时他们一般都身穿旧棉衣,脚穿高帮胶鞋,然后专门走在河沿或塘边细细观察。一般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何处有鱼洞,哪一种泥坎下有鱼,但掏鱼洞的人一看一个准。据说,主要通过看水面上有没有翻出细细的水泡

江海风物

时下说到捕鱼方法,人们都知道张网捕、鱼竿钓、丝网夹、鱼叉戳、鱼笼罩、鱼鹰捉等等,其实除了这些,还有一个比较原始也很有趣的捕鱼方法,那就是洞中掏鱼。这种方法现在已经很少见了,而过去在我们苏中通东一带乡间非常盛行。

所谓“掏鱼洞”,就是捕鱼人将手臂伸进水下的鱼洞中,然后直接用手把鱼掏出来。从洞中掏出的一般都是鲫鱼,时间也大都选在冬季,越是天寒地冻,掏鱼的把握就越大。因为每当天气寒冷,河塘中的鲫鱼就喜欢钻进向阳一侧河坡水下的泥洞中,或者是水下的泥坎下,可